



第一章 1910 至 1930 年代的日本

—— 通往统治亚洲之路

一、两面的帝国主义与天皇制立宪主义

1. 两面的帝国主义

本章内容是对日俄战争以后直至进攻珍珠港前夜这一期间，以通史的方式作一全面考察。正如副标题所示，这一期间最为突出之处，在于它正处于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之中，而又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自日俄战争后的 1905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1918 年这 14 年间，日本向东亚扩张，并达到最初的高峰（以下称第一时期）。第二，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19 年至满洲事变爆发的 1931 年这 12 年间，日本的扩张有部分倒退，不得不暂时克制的时期（以下称第二时期）。第三，是自满洲事变开始的 1931 年至对美英战争开始的 1941 年的 11 年间，是日本再次转向扩张，并面临挫折与灭亡的时期（以下称第三时期）。

日本虽然通过这三个时期使其发展方向大为改变，但这并不是根据某种长期计划的预定行动。再分别从这三个时期来看，日本所走的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不断出现曲折的之字形道路。几

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历经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深刻对立，或者是伴随着重大的抗争，而选择了某种发展方向。

这样的不确定性与混沌不明，其原因即在于自称为“大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体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状况。首先，关于经济上的问题，让我们分别就这三个时期中的每一时期，来看一看那些广为人知的见解。

在属于第一时期的 1918 年 3 月，元老山县有朋曾就出兵西伯利亚谈到如下的“时局意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

“在东亚，帝国之兵力即使能与德、俄之威力相匹敌，但遗憾的是，军费之筹措、军需品之供给仍不能以帝国独自之力量补充之。此次大战之结果，虽然帝国之财力大为增进，各种工业亦有显著发展，但财力之增进多亦不出十数亿，工业之发展亦尚不足以保障武器弹药之独立。……今日帝国仰仗之补给，竟然不得不依靠于对帝国之对俄政策最无好感之美国。因此，余以为，为求将来之安全，应进一步就英美之对俄政策实现根本性之协商，表明与彼等相互合作行动之精神，乃最为必要……。”

在属于第二时期的 1921 年 12 月，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曾经这样说道（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海军战备 1》）：

“国防并非军人专有之物。战争亦非仅军人所能为。若不以国家总动员当之则难达目的。因此，于筹集军备之同时，为发展民间工业之力量，即应奖励贸易，以真正充实国力，否则，无论军备如何充实，亦不能予以充分运用。……日本连推行八八舰队之计划都感财政上之严重困难，值此之

际，无论美国如何扩张，对其亦无可如何。……对于美国所建议之所谓 10:10:6，虽然不能满意，但如果设想此一军备限制方案不能成立之状况，则岂非以容忍 10:10:6 为上策耶。”

在属于第三时期的 1939 年 3 月，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曾就加强防共协定的问题，向驻意大使白鸟敏夫和驻德大使大岛浩发出电报称（角田顺编《现代史资料 10 日中战争 3》）：

“正在向处理支那事变迈进之帝国面临的经济形势，眼下实际上已处于不得不相当重视同英美之经济关系的局面。……在昭和 14 年度，帝国所必需之军需品约为 13 亿日元，用以扩大生产力的用品约为 10 亿日元，作为制造出口品所用之原料，其进口费用约需 5 亿日元，再加上向日元经济区提供之必需品与民用品，均需要庞大之金额，而以出口贸易、所产黄金及其他金银而言，无论如何实难抵偿进口之 20 亿日元。由此观之，应该指出帝国在此二三年间乃处于极为困难之时期，与英美经济关系之恶化将立即成为完成上述各项计划之严重障碍，最终甚至有对处理支那事变产生重大影响之虞。”

像元老、海军大将和外相这样的帝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些见解，几乎都是毫无保留地清楚表明，日本在制定对外发展方向时，尤其是围绕着推进战争及军备问题，在整个时期都受到了怎样的限制。这就是日本与先进的列强在生产力上的巨大差距。尽管如此，为了推进和维持与其国力不相适应的对外扩张，日本还在资金、器材与贸易上仰赖于先进列强尤其是美英。

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日本遂忝列世界八大强国之末

座，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又进而成为世界的五大国乃至三大国之一。只是垄断性地保持着在东亚的军事力量，才使其地位的这种上升成为可能。然而，这个军事强国在经济上乃是弱国。表 1 表明，日本在吞并韩国而确立帝国主义时，乃是一个与列强相距多么遥远的经济弱国。

表 1-1 1910 年的八大强国比较

	煤炭产量	铁矿石产量	铄铁产量	粗钢产量
	千吨	千吨	千吨	千吨
英国	268,676	15,470	10,173	6,476
美国	455,041	57,930	27,742	26,514
德国	222,302	22,446	13,111	13,100
俄国	25,430	5,742	3,047	3,314
法国	38,350	14,606	4,038	3,413
奥地利	13,774	2,628	1,505	2,174
意大利	559	551	353	732
日本	15,681	67	72	9

注：据 B. R. 米切尔编（中村宏等译）《麦克米伦世界历史统计》（原书房，1983~1985 年）制成。

经济弱国日本为了作为军事强国而存在下去，在政治上就有必要谋求同先进的列强的某种合作；在经济上，则不得不由先进的列强来保障其资金、材料以及能够用以筹集资金、材料的贸易关系。然而，在激烈动荡的国际政治中，同哪个列强进行怎样的合作，或者是进行怎样的对抗，这样的问题当然会在国家领导人内部不断地引起意见的分歧与对立。还有，在经济上仰赖于政治

上的竞争对手这一现实情况，一方面会产生对此予以容忍和希望加以维持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反，也会产生企图摆脱和打破这种局面的反感。

大日本帝国乃是具有两面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两面，就是指它具有军事强国和经济弱国这样两张面孔，在与列强对立和抗争的同时，在经济上又特别仰赖于美英，而由于这种仰赖（是 dependence，而不是从属 Subordination），它又作为军事强国而自立（independence），从而具有双重意义。这种作为帝国主义的两面性的矛盾，正是导致日本对外方针的不确定性与混沌不明的根本性原因。在第一个时期，日本于日英同盟与日俄同盟之间东跑西窜的同时推进向外扩张，在第二个时期，又顺应华盛顿体制，通过与美英协调以谋求帝国之安稳，在第三个时期，则企图打破对美英的仰赖，向华盛顿体制挑战，并发展至通过日德意三国同盟而同美英全面对抗。

2. 天皇制立宪主义

日本的对外方针的不稳定性与混沌不明，还由于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与政治体制的两面性而更趋严重。两面性的一个方面，乃是专制主义的侧面。在大日本帝国，曾有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君临，而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被当成了“万世一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是被当成现人神的具有神权而超越一切的天子。根据帝国宪法，天皇还是总揽统治权的元首，是拥有有关立法、帝国议会、官制、军队编制、外交、戒严、大赦等国务大权的具有绝对最高权力的人。天皇同时还是统率陆海军的陆海军大元帅。

表现国家权力结构专制主义侧面的机构，首先是元老的存在。在第一个时期，贯通于国务与统帅的帝国的最高方针，系由萨摩与长州两藩出身的元老商议后所决定。然而到了第二个时

期，元老相继谢世，出身于宫廷贵族的西园寺公望成为惟一的元老，在第三个时期，便是由以西园寺为中心的内大臣、宫内大臣、侍从长及其亲信组成的宫中集团，尊奉昭和天皇，并在决定最高方针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作为专制主义的机构，其次是“回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之国务”的枢密院，第三是“以皇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的贵族院，然而，最强有力的乃是帝国的陆海军即所谓军部^①。陆海军由于统帅权的独立而可以不容许内阁参与军队的指挥和运作。根据军部大臣武官制，只有大将和中将能够担任陆海军大臣，根据帷幄上奏权，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陆海军大臣得直接向天皇上奏军机而与内阁无关，并可制定军令（关于统帅事项的敕令）。帝国陆海军还以《军人敕谕》中所说“我国之军队世代为天皇所统率”为背景，夸耀自己是天皇亲自统率的军队。

以上所述的天皇本人、元老、宫中集团、枢密院、贵族院、帝国陆海军以及军部这些专制主义的机构和机关，都是由于具有神权和超越一切的天皇而得以有存在的根据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一切称为天皇制。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就是对应于日本国家的这种专制主义侧面的宪法学说。

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另一面，就是立宪主义。帝国宪法规定，天皇“依据此宪法之条款”而行使统治权，“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凡法律须经帝国议会之协

^① “军部”一词虽也作为泛指军队或军事当局的超越历史的概念来使用，但自1910年代初期以来，军事当局尤其是陆军方面，把它作为与政府即行政部门并立的特殊的国家机构乃至政治势力，赋予其这样的意思加以使用。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上便也普遍认可了这后一种概念（井上（清），1975年）。

赞”。还规定，与贵族院共同构成帝国议会的众议院，系“以公选之议员组成”，“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诏敕，须国务大臣之副署”。实际上，天皇平时也并非无限制地直接行使其绝对权力，通常是把国政交给由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政府）来处理（统帅之权交给以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为首的统帅部处理）。以美浓部达吉为主所提倡的天皇机关说，就是与日本国家的这一立宪主义的侧面相对应的宪法学说。

上述这样具有截然相反的两面性的大日本帝国的国家权力与政治体制，可称为天皇制立宪主义。然而，至于这两个侧面中的哪一方面更占有优势呢，这就只能由担当国政的内阁的性质与力量来决定了；还有，来自民众的压力的性质与程度，也是变动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时期的国政，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藩阀出身的元老掌握和主导的。但是，以众议院为基础的政党通过与藩阀的合作，逐渐加强了参与国政的程度，民众尤其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暴动，动摇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在第二个时期开始时及后半时期，政党掌握了内阁，专制主义这一侧面的主要构成因素，则主要由藩阀、元老转为贵族院、枢密院及军部。民众广泛展开社会运动，加速立宪主义的进展，其最根本的目标在于希望推翻天皇制立宪主义。然而，在第三个时期，内阁脱离政党的掌握，在军部的主导之下，专制主义的侧面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立宪主义无止境地后退，民众大体上也追随于此，其根本目标便成为希望废除立宪主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面性这一根本性原因，以及上述天皇制立宪主义的两面性的相互矛盾，还有国家权力机构中国务（政府）与统帅（军部）之间的分裂，遂使日本对外方针的不确定性与混沌不明更趋严重。那时，一般多认为专制主义的侧面与立宪主义的侧面是分别同反美英的扩张主义和亲美英的协调主义相结合的，但是，这种结合未必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从第二个时期

的后半段至第三个时期的元老与宫中集团，大体上即是采取亲美英的协调主义。

下面，以两面的帝国主义和天皇制立宪主义的变化及持续为主线，对从日俄战后至对美英开战的通史作一宏观考察。

二、大日本帝国的确立

1. 经营满洲与吞并韩国

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日本，根据 1905 年 9 月的朴次茅斯和约而得到了俄国转让的中国辽东半岛尖端部分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大连间铁路的所有与经营权。它所面临的对外课题，就是如何实现以此为支柱的对满洲的经营，还有就是如何实现作为此次战争重要目标的对韩国的统治。

关于对满洲的经营，日本于同年 12 月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和附属协定，除了使之同意朴次茅斯条约所规定的俄国向日本的转让，使之承认铁道守备兵的配置权外，还获得了安东—奉天间铁路的经营权、满铁并行线的敷设禁止权等等。

但是，关于经营满洲的机构和方式，从一开始就不断出现纠纷。日本军队在占领地区实施军政，在媾和之后的 10 月，又在满洲军总司令官隶属之下设置了关东总督府，继续实施军政。这招致清政府的抗议，经济活动受到了限制的英国与美国，也于 1906 年 3 月相继迫使日本开放满洲的门户。对事态感到忧虑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于 5 月召集元老及政府、军队首脑参加的满洲问题协议会，抑制陆军方面的不同意见，并确认了废除军政和开放满洲的方针。军政于当年年底被废除，其间于 9 月，设立了关东都督府，以代替关东总督府，但是都督系由陆军大将、中将担任。在关东都督府中，无论机构上或人事上，都明显继承了

军政的色彩。此后，围绕如何施政也不断出现都督府（陆军）方面与外务省、领事馆之间的摩擦与对立。围绕满洲经营问题的纠纷，正是天皇制立宪主义自身的矛盾在海外殖民地的表现。陆军虽然有所后退，但是，它却以占领和军政这一既成事实为背景，在满洲构筑起了坚固的基础。

关于对满洲铁路的经营，也曾出现过究竟是国营还是组织公司的对立，结果采用了组织公司的方针。作为日本最大的康采恩，于 1906 年 11 月设立了除铁路外还兼营港湾、矿山、炼铁等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但是，虽然说是股份公司，但满铁股本（2 亿日元。1906 年度的财政支出是 4.6428 亿日元）的半额是由政府出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任命，并拥有铁道附属地的行政权，所以满铁事实上乃是国家机关，与关东都督府、领事馆鼎足而立，在满洲经营问题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强烈刺激了俄国、中国、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并迫使各国面对这一局面。另一方面，鉴于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受到挫折，遂有预测其将把矛头指向印度方面，在欧洲，则是英德对立代替英俄对立，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日英两国谋求日英同盟的继续。1905 年 8 月签署的第二次日英同盟协约，把第一次协约的防守同盟强化为攻守同盟，规定相互承认和维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和英国在印度的防卫，期限定为 10 年。

法国由于同盟国俄国地位的下降，和为了对付法属印度支那独立运动的高涨，也在同日本接近。另一方面，日本被同意从巴黎借款，通过外债而加强了对法国的仰赖。两国于 1907 年 6 月缔结日法协约，分别确认了两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日法协约的成立也使日俄接近，而希望形成英、法、俄对德包围网的英国，也促成了这一点。日本一方面警惕俄国挑起复仇

战争，但另一方面为了战后经营而又希望避免再战，而俄国方面也因面临国内革命运动的激化与财政的困难，而谋求与日本妥协。1907年7月签署的第一次日俄协约，确认了日本在南满洲和俄国在北满洲的势力范围，相互承认了日本在韩国的行动自由和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

迨至8月，英俄协约成立，与1904年的英法协约一起，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对德阵营。日本以日英同盟、日法协约、日俄协约为媒介，与这一阵营联系起来，从而加强了在东亚的国际地位。但是，英俄协约的成立削弱了以对付俄国为主要目标的日英同盟的意义。围绕究竟是北进南守即陆主海从抑或是北守南进即海主陆从这一战略方针的对立，与其纠缠在一起，关于究竟应该重视日英同盟抑或是应该重视日俄协约，在日本的国家领导人中又将再次出现对立与动摇。日本于1910年7月缔结第二次日俄协约，确认两国在南北满洲的特殊利益，并约定为维护 and 保卫这一利益而共同行动和相互援助。接着，又于1911年7月签署了作为“帝国外交之精髓”的第三次日英同盟协约，但是免除了日美战争时英国的交战义务。围绕着究竟是日英同盟抑或是日俄协约的对立与动摇进一步加剧。

虽然包含着这种不稳定因素，但是，在日英、日法、日俄之间毕竟形成了由同盟及协约带来的合作，不过在日美之间却发生了对立与对抗。日美对立与对抗的原因之一，是排斥加利福尼亚州日本移民的问题，从1906年至第二年，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中心，甚至发生了WAR SCARE（战争恐吓）。不过，正如1908年9月第二次桂内阁在《对外政策方针决定之件》（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中所说的那样，美国乃是“我商业上之大主顾”，与该国“亲密交往”是不可缺少的。通过1907年11月至1908年2月缔结的日美君子协定，日本自我限制对美移民，又通过1908年11月的高平—罗脱协定，表明对夏威夷、菲

律宾等地没有领土野心，以努力消除美国的不安。

这时，日美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满洲问题。美国于 1905 年由哈里曼提出日美共同经营满铁的建议，1909 年又由诺克斯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的方案，企图由此而打破日本在满洲的优势与垄断。日俄加强合作（第二次日俄协约），把美国排挤出了满洲，但是，正是围绕着对满洲统治的日美对立，成为导致日美战争的最大原因。

日本一方面摸索着与先进列强间的角逐与合作，一方面则致力于完成对韩国的统治。通过 1905 年 7 月的桂一塔夫脱协定、8 月的第二次日英同盟协约、以及 9 月的朴次茅斯媾和条约，日本分别使美、英、俄承认了其对韩国的统治权。11 月，日本又进一步强迫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夺取了韩国的外交权，并于 12 月设置了统监府。

担任了首任统监的伊藤博文，推进了韩国的保护国化。1907 年 7 月，日本通过第三次日韩协约而掌握了韩国的全权，8 月，又强行解散了韩国军队。在韩国，展开了爱国启蒙运动和义兵运动，激烈抵抗了保护国化，但日本对此予以残酷的镇压。然而，保护政治显然已经不能掌握韩国的人心，又有必要消除美国等列强干涉的危险，于是日本便不仅限于推行韩国的保护国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其吞并。

1909 年 10 月伊藤被暗杀，1910 年 8 月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而灭亡并吞并了韩国，终于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一贯追求的对朝鲜半岛的完全统治即殖民地化。10 月，设置朝鲜总督府，陆军大将寺内正毅就任首任总督。

日本所推行的韩国的殖民地化，在国际政治中真是一个特异的情况。欧美列强把非洲、亚洲、澳洲等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明显落后的地域变为殖民地，从而能够以相距悬殊的文明和经济力量对这些地域实施绝对统治。与此相反，对于日本来说，韩

国（朝鲜）在历史上甚至曾是文化上的发达国家。要让这样的韩国国民容忍吞并的局面，终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吞并还是统治，便只有依靠武力而别无他法了。

1911年2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日本才获得了关税自主权。日本这时才好不容易解除了对列强的从属，作为大日本帝国在名实两方面都得到了确立。

2. 从桂园时代至大正政变

若想实现对满洲的经营与吞并韩国，无论是为此抑或为了同列强角逐与合作，都必须增强军备。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提高了威信的陆海军，虽然分别都在追求扩军，但陆军大体上是为防备俄国的复仇而主张陆主海从即北进南守；与此相反，海军则只重视日美对立，提倡海主陆从即北守南进，与之对抗。伴随着1905年8月签署的第二次日英同盟协约加强了攻守同盟的性质，经过陆海军的协商，便于1907年4月决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用兵纲领》。国防方针规定，“应该假定为将来之敌人者，以俄国为第一，美、德、法诸国次之”，所需要的兵力是，陆军平时为25个师团，战时为50个师团，海军为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8艘组成的八八舰队（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大本营海军部 联合舰队1》）。

国防方针的制订与决定只是由陆海军来进行，而政府并不能参与，西园寺公望首相仅限于向明治天皇陈述所见而已。这一方面显示出了军事官僚的政治势力化，但另一方面则开辟了政府以不参与为挡箭牌而从财政方面抑制扩军的途径。

西园寺首相曾就国防方针上奏称，“现正值大战役之后，我国财政之状况不能容许将其全部实施，希望暂且假以时日，与国力相适应而斟酌缓急”（《明治天皇纪 11》），而实际情况是，日俄战后的财政已经处于十分恶化的境地。日俄战争的战费高达

17.1644亿日元。这远远超过了日本经济的实力，而必须借 8 亿多日元的外债。1905 年底，尚未偿还的国债与内外债加在一起，竟高达 18.7039 亿日元，支付其本息是财政的沉重负担。还有，民众被迫遭受人力物力上的过重负担与牺牲，而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遂使胸中的愤懑一举爆发，酿成火烧日比谷事件，而为了安抚民心，一方面必须广泛地施以利益，另一方面，则必须设法减轻其负担。

充分满足扩张军备、偿还债务与施以利益和减轻负担，这简直可以说是内容完全相反的相互矛盾的要求。担当着政权的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政治势力，只有相互联合、妥协和让步而别无他途。在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政治势力中，首先是以山县有朋为首、以长州阀为核心的山县阀（官僚势力），他们执陆军、贵族院、枢密院之牛耳，并以桂太郎为主炮手。其次，是以松方正义、大山岩等为首的萨摩阀（萨派），山本权兵卫统领的海军在其掌握之中。第三，是拥戴西园寺公望为总裁并由原敬、松田正久领导的众议院第一大党政友会。第四，是以大隈重信为总理并由大石正巳、犬养毅等领导的第二大党宪政本党（1910 年 3 月以后为立宪国民党）。

首先，是山县阀与政友会的联合。面临火烧日比谷事件的第一次桂内阁，在处理完毕日俄媾和条约问题之后，即于 1905 年底下台，而把政权交给了西园寺。第一次西园寺内阁让政友会的原敬和松田入阁，作为政友会与官僚势力的联合政权，于 1906 年 1 月成立，从而开始了所谓桂园时代。3 月，政府把日俄战争后本应废除的非常特别税延续下来，又为了偿还内外债的本息而在预算中特设了减债基金，实行了铁路的国有化。还以铁路为中心，在高等教育机构、兴修水利等方面增加投入，以所谓的积极政策谋求加强政友会的地盘。另一方面，则推进扩军，于 1907 年新设了两个师团。其结果是，陆军形成为 19 个师团的体制。

然而，在当年年底发生了战后的经济危机，政府断然实行增税。对此，工商业者展开了要求废除三恶税（盐专卖、通行税、织物消费税）的运动，银行资本鉴于公债的下跌而背离了政府。在此期间的 1906 年 2 月，政府正式承认日本社会党等，对社会主义运动显示出了灵活的姿态。但是，以 1908 年 6 月的赤旗事件为契机，山县等发动倒阁，内阁于 7 月总辞职。该内阁在对外方面相继缔结了日法协约、第三次日韩协约和第一次日俄协约。

继此之后，第二次桂内阁于同月成立，政友会继续成为执政党。政府企图通过 10 月的戊申诏书和次年以后的地方改良运动来笼络人心，在 1910 至 1911 年，又通过大逆事件扼杀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政府还增加公债偿还额，顺应银行资本的要求，并致力于整顿财政，抑制了扩军，而在铁路政策等方面，则采取积极方针，使政友会满意，从而确保得到它的合作。1911 年 1 月，桂首相强调同政友会的“情投意合”，并约定将把政权让与政友会。该内阁在对外方面，则是缔结了高平—罗脱协定、第二次日俄协约和第三次日英同盟协约，实现了对韩国的吞并与关税自主权。

1911 年 8 月，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政友会方面有原敬、松田正久等 3 人入阁。然而，在财政方针上，政府内部陷于对立。与原内相希望采取积极方针不同，山本达雄藏相则提倡紧缩财政，而陆海军则分别逼使扩军。10 月，辛亥革命一爆发，陆军即计划出兵中国，并要求增设两个师团。另一方面，海军则因英国超大型战舰（1906 年 12 月竣工）和超弩级舰的出现，而担心自身战斗力的降低，要求紧急扩充舰队。

在内部纷扰持续不断之际，明治天皇于 1912 年 7 月逝世，改元为大正。对于山县、桂等官僚势力而言，作为其权势之源泉的明治天皇之死，乃是巨大的打击，在政界以及新闻出版界便产生了对变革的期待。

政府一方面承认充实海军的紧迫性，但另一方面则拒绝了陆军增设师团的要求。对此，上原勇作陆相于 12 月通过帷幄上奏提出辞呈，而山县拒绝提供后任陆相来接替，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遂总辞职。^①

否认了增设师团的要求，虽然是政友会与海军相联合而使陆军败退，但一般说来，陆军的行动更给人以横行不法的强烈印象。8 月，刚担任内大臣和侍从长不久的桂太郎组建第三次内阁，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国民党的犬养毅等众议员及新闻记者等组织起了宪政拥护会，从年底至 1913 年初，以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口号的运动扩大到了全国（第一次护宪运动）。

在整个桂园时代一直在野的宪政本党即国民党中，有希望通过与藩阀联合而获得政权的大石正巳等改革派和右派，也有主张反对藩阀和提倡民党主义的犬养毅等非改革派和左派，两者之间的对抗不断。当桂筹划建立反对政友会的新党时，右派即脱离国民党而参加桂的新党，与桂系的官僚们一起建立了立宪同志会。

立宪同志会的建立便断绝了多年间桂与政友会的联合。面对拥护宪政运动的高涨，政友会遂转向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与桂、陆军和同志会相对抗。桂首相使 1 月 21 日的议会休会 15 天。2 月 5 日，议会在民众的包围中再度开会，政友与国民两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尾崎发表了强烈弹劾桂的演说。桂再次使议会休会 5 天，甚至仰赖天皇下达敕语，让西园寺“尽力化解众议院之纷争”，亦即撤回不信任案。桂利用天皇的战术反而是火上浇油。10 日，数万民众包围了再次开会的议会。桂终于下决心内阁总辞职，宣布议会休会 3 天。民众得知再次休会后十分愤

^① 大正政变一词原来系指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倒台（大津淳一郎、京口元吉等），但近年则专指第三次桂内阁的倒台。